

长征秘闻



长征秘闻

《参考消息》专辑



《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

·内部读物·

长 征 秘 闻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

一九八六年四月

编 者 的 话

美国著名作家、前《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新著《长征秘闻》（直译为《长征——没有说过的故事》）一九八五年由美国哈泼—罗出版公司出版。本书一问世就在美国引起轰动，也引起其它国家的注意。

《长征秘闻》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文笔，描述了长征的整个过程，使五十年前的长征画卷得以再现。它是外国人撰写的一部比较客观、比较全面地记录长征史诗的著作。

据介绍，作者为撰写这部书作了两年的准备。他搜集、查阅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长征的大量书刊材料。一九八四年，他两次来华，采访了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及党史专家；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从南昌出发，乘吉普、骑骡马、步行，沿着长征的路线走了一趟，进行了数百次采访。他作了大量的调查，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作者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要写出可同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媲美的长征的非凡的历史，而且要展现参加过长征并且正在领导新长征的中国领导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因此，作者采取了将历史和现实穿插结合的写法，使故事没有陈旧感，而显得生动活泼。

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很多，在译编过程中，我们尽量作了查问、核实，对于少数一时难以核实的作了译音处理。鉴于作者本身的局限性，尤其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中，有些是凭提供者的记忆，有些是辗转传闻，因此，不尽翔实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尊重原著，一律照原文翻译。我们相信读者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问题，也欢迎读者对书中内容失实和翻译错误之处给予指正。

一九八六年四月

作者介绍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是明尼苏达人，他在那里出生、成长、上学，又是在那里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他最初立下的志向是要到中国去担任新闻记者，可是他的职业生涯却使他去到了相反的方向。

他曾先后在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为合众国际社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驻伦敦、中东和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后来他被派往重庆，但他还未抵达这个新岗位即又被召回纽约，担任合众国际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在一九四九年转到《纽约时报》工作，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他在苏联任职多年，到过中国边界沿线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外蒙古的许多地方。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于他在外蒙古发现了苏俄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最初征象，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和东南亚。他在远东呆了很长时间；并且在一九六六年，在中国仍然对美国人紧闭着大门的情况下，沿着它的边界绕了整整一圈，从中国的外围审视这个国家。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他经常去中国，足迹遍及中苏边界一带、中国西北端、西藏和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崎岖不平的公路沿线，在一九八四年又沿着长征所经过的路线长途跋涉达七千四百英里之遥。

目 录

引 言 《长征》写作缘起	(1)
第一章 秋夜月下行	(4)
第二章 “赤匪”的崛起	(11)
第三章 长征前夕	(19)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23)
第五章 最初的步骤	(30)
第六章 计谋	(37)
第七章 担架上的密谋	(42)
第八章 妇女	(48)
第九章 第一场激战	(54)
第十章 红军改变路线	(62)
第十一章 遵义	(67)
第十二章 毛泽东执掌大权	(74)
第十三章 绵里藏针	(79)
第十四章 毛泽东转危为安	(84)
第十五章 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88)
第十六章 毛泽东的迷魂阵	(92)
第十七章 金沙江	(99)
第十八章 敌血为盟	(104)
第十九章 留下的人	(110)
第二十章 死亡军团	(116)
第二十一章 泸定桥	(120)
第二十二章 大雪山	(125)
第二十三章 会师	(131)
第二十四章 边远地区	(137)
第二十五章 魔毯	(143)
第二十六章 艰难的时刻 辉煌的荣誉	(148)
第二十七章 家	(155)
第二十八章 会合	(162)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169)
第三十章 冷眼看世界	(176)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187)
注释	(192)

《长征》写作缘起

每一场革命都是在自己的传奇式事迹鼓舞下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瓦利福奇*深深铭刻在爱国志士的心中。乔治·华盛顿和他的部下正是因为在那场考验中经受了锻炼，才终于取得胜利。

法国人攻陷了巴士底监狱，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彼得格勒攻陷的则是冬宫。在攻陷巴士底监狱的时候，里面只有七名囚犯；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攻入冬宫的时候，守卫人员也只是少数十几岁的少年和一些妇女。尽管如此，这些事件还是成了革命的象征。

中国一九三四年的长征可不是象征，它是对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考验，是一首伟大的人间英雄史诗。

中国的长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远征”，不是一次军事战役，不是一次军事胜利。中国的长征是人们求生存的斗争的胜利，是一次从蒋介石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可怕而又没有休止的退却，是一场好几次都险些全军覆没但又绝处逢生的战斗。这一战斗没有预定的计划。毛泽东受到排挤，没有参加准备工作，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得到通知。长征的最后结果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在本世纪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事件能够这样打动全世界的心，这样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未来。中国的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红军渡过中国南部一条小河于都河开始，一直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就是说，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的国度中取得胜利。

这一胜利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来到的。满清帝国内部腐败无能，病入膏肓，外部受到西方强暴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摧残，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衰落过程。革命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胜利。先是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军和他们发动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伪基督教起义。后来又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也带有神秘、狂热和排外的色彩。最后在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组织松散的民主革命派推翻了旧帝国，中国从此陷入公元前四百年战国时期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舞台上真是五光十色：有人英勇战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有人时乖命蹇，演出了一出悲剧；有人策划阴谋于密室；有人以杀人为乐事；有人背信弃义，卖身求荣；有人粉墨登场，博人一粲；有人运筹帷幄，显出高超军事才能；有人翻云覆雨，玩弄政治诡计；有人劝人行善，以挽回世风相标榜；有人宣扬教义，要人在宗教中求得慰藉；还有人互相仇视，不共戴天。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这出戏剧至今还没有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 瓦利福奇为美国费城西北一小村。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率部在此扎营，度过一七七七年的冬天，衣单粮绝，异常艰苦。——译者注

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这出惊心动魄的戏剧的是埃德加·斯诺。他在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黄土高原共产党人的圣地，访问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年前才到达那里的，一路上总共行军六千多英里，身经百战，饥寒交迫，穿越了地球上最崎岖不平的地区——中国最偏僻的地区，渡过了二十四条江河，照毛泽东计算，还翻越了一千座大山。

在红军主力一方面军的长征中，据说出发时大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经过一年时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有四千人跟随毛泽东到达陕北。

我最初是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才对长征有所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是读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以后才对长征有所了解的。长征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也打动了我的心。斯诺当时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写出来。”他一度希望亲自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

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到达中国。不久以后，我向已故的周恩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允许我沿着毛泽东的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一趟，把长征的故事写出来。同我一道提出这个建议的还有老中国通杰克·塞维斯*。在十多年当中，我们一再反复提出这项建议。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当时正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动乱年代，文化革命和“四人帮”的年代。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战友们，过去在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中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战友们，这时已经零落星散。其中有许多人死去了。有许多人在文化革命的恐怖中一蹶不振了。有一些人遭到杀害。还有许多人在监狱中受煎熬。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你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英雄，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戴上了头号坏蛋的帽子。给你扣帽子的人就是那些拚命想从毛泽东手中接班的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大可能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的。就是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和他的遗孀江青及其帮派同伙遭到逮捕和审讯以后，通向长征之路的大门也没有很快打开。只是到了邓小平逐渐掌权，老一辈英雄一个个恢复名誉并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以后，最重要的是，只是到了当局对历史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新态度以后，重新回顾长征的历程才开始显得是可行的。

在那些年月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的决心始终没变，那就是一定要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长征的故事记录下来。一九八三年八月，从北京传来了消息：通向长征之路的大门打开了！必需的人力物力、档案和历史资料都可交给我使用。我可以沿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一里也不遗漏地走一趟。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决定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和前外交部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的妻子夏洛蒂和我飞到了北京，并且抓紧时间分别会见了一些幸存的高级将领、党内重要人物的遗孀（这些重要人物中有一些是在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而死的）、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快，塞维斯也前来同我们会合。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就沿着长征的路线踏上征途。陪同我们的有长征问题专家、北京全国军事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翻译张援远。

* 在麦卡锡时代受迫害的美国外交官，他的中国名字为“谢伟思”。——译者注

我们先是飞到江西省省会南昌。长征就是从那个省份开始的。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偏僻山岭，我们会见了参加过长征的几十名男女老战士。促成长征的各种危机和冲突的细节深深印入我们的脑海，这才知道这次长征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溃退”。

这是起点。然后我们就循着红军的路线前进，但不是一里不漏地走完全程。我们略过了一些地方，特别是贵州省境内的一些往返曲折的行军路线，并附带考察了红军非主力部队经过的地带。我们爬上了陡峭的羊肠小道，从金沙江渡口开始，在靠近西藏的地方穿过火焰山和狮子头，尝到了红军当年精疲力竭的滋味，又骑着骡子和马走出崇山峻岭，向大雪山前进，道路两旁在五月底仍然是茫茫白雪，最后我们向可怕的草地进发。在草地中，象在帕森达尔*一样，战士们一不小心就陷入无底的泥沼中，谁要是伸手援助，便会被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次旅行全程七千四百英里。我们乘坐吉普车、面包车和指挥车，走过不少大路和小径，花费了两个半月时间。然后，我们又访问了更多的人，并且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又到中国去了一趟。

只有亲临其境，作一次实地旅行，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和他的男女战士们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所经过的地区至今仍是一片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国人。在一个又一个小镇上，谁也不记得有外国人来过。

过去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旅行。在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象我们那样再作一次这样的旅行。

本书就是我们多方搜集资料、进行数百次访问，查阅文件和档案编写而成的五十年前的长征的记录。我向中国人提出各种难以解答的问题。他们总是尽力加以解答，有时还要反复查阅资料，直到查清原来忽略的事实为止。

这个故事是一首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普通的战士们和他们的指挥官们英勇无比，气壮山河，而且还因为它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炼出了一个兄弟般的集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集体把蒋介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终于取得了政权。

毛泽东晚年的疯狂行径使这个兄弟般的集体分崩离析，给这出英雄的戏剧添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现在，令人惊异的是，幸存者已经东山再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他们已经引导中国走上他们所说的“新长征”的征途。这次新长征同原来的长征一样艰难，而且可能成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和政治实验。但是，这件事以及文化革命和四人帮的垮台是另外一个故事。本书所讲的只是长征的故事——我在中国历史学家和幸存者本人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全部材料。

今后，在某些问题上，也许还会有别的一些插曲公布于世。但是，本书所讲的故事已经足以说明，人类的这一壮举是无与伦比的。也许，它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挥师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军多少有点相仿，而且出乎我的意料，还同美国大队人马翻越群山和草原向西部扩展有一些相似之处。

* 帕森达尔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一九一七年七月到十一月，交战双方在那一带进行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在七月底的一次战斗中，英军曾因暴雨大作，道路泥泞难行，而无法推进。——译者注

但是，把任何事件同长征相比都是不贴切的。长征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英雄主义精神激起了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的美好憧憬，并且推动中国走向至今谁也无法预言的未来。

第一章

秋夜月下行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四壁粉刷得雪白的医院病房。屋外院子里，从那些阔叶樟树的树荫下，传来了一阵喧嚣声，有高亢的口令声，有嘀嘀哒哒的军号声，还有嚓嚓的脚步声。声音过处，晴空中扬起一小团一小团的尘埃，病房里那位病人面颊清瘦，左腿上打着石膏，他伸长着脖子向外张望，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红军一定有什么新的调动事先没有通知他。这时一位护士正好迈步进门，他大声问道：“出了啥子事情罗？”

“我不知道，司令员，”她一面回答着，一面向外面瞅着，“没有通知我们。”

陈毅嘟嘟囔囔地诅咒着。自从六个星期以前他带着臀部的枪伤从兴国县前线被抬下来以后，他已经诅咒过上百次。他的伤口老是愈合不起来，伤口里不断发现骨头碎片。

陈毅是年三十三岁，四川人。他是一个乐观自信的人，性格开朗，素以诙谐幽默著称，当时已是红军高级指挥官。但是，这天他心情不佳，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揣摩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事。他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为自己的伤口感到恼火。不一会儿，那位护士又回来了。“有人来看你，司令员，”说着，她就匆匆跑过来把床上的枕头整理好，把床单抻直。陈毅越过她的肩膀朝门口望去，一眼瞧见他的老朋友、老同志周恩来正跨进病房。此后陈毅始终记得周恩来到医院看他的这个日期。那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正是周恩来把后来成为长征的那次军事行动告知他的日子。^①

于都是赣南一座死气沉沉的城镇，它地跨于都河两岸，人口不到一万。那里的生活平淡无奇，只有一艘渡船在河上来回摆渡，还有一处市场。一九三四年十月间，那里弥漫着一种欢乐幸福的情绪，只是还掺杂着一点紧张不安的气氛。天气是舒适宜人的：白天暖融融，夜晚转凉爽，几乎完全不下雨。大多数农作物已经收进来，只有晚稻、一部分荞麦和地瓜仍在田里，有待收获。整棵整棵的豆秸连蔓带根晾在青瓦屋顶上，枯秆弯弯地搭在高高的屋脊上。各家庭院里靠墙排着一行赤褐色陶缸，满缸的豆瓣酱。角落里是一堆堆绿皮红籽的苦瓜和红橙色的南瓜，还挂着一串串红色的干辣椒。农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粮食将足够吃到下一季作物开始收获。但是，于都当时的形势也有惶惶不安的一面。红军在这年夏天征购了大量稻米，大力招兵的活动也不同于寻常。这年的收成很不错，因此人们打算在春种秋收、先耙田松土再移苗插秧这一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循环中稍稍休息一会儿。但是，似乎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中秋节已经过去，门楣上的红福字和两扇门上面目狰狞可怕的门神像已经有些破旧，人们希望它们仍能保佑他们祛灾避邪。^②

刘英那时正在于都，计划在那里花几星期的时间为红军招募新兵。她是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那年她二十六岁，个子很小，勉强算有五英尺高，娇小玲珑得像个孩子的玩具娃娃。海伦·斯诺有一次说，她不能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怎么会没被大风刮走。^③后来，在刘英同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洛甫结婚的时候，洛甫也说过这样的话。刘英个子虽小，却有一种象玻璃钢一样坚毅不屈的精神，而且有毛泽东关照她。一天，毛泽东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团部，悄悄地同这位个子小小的招兵工作人员谈话。他对她说，她必须立即离开于都，到赣南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瑞金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不能走，”刘英在五十年后回顾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还得再招一些新兵才能完成定额。”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她必须回去。刘英感到迷惑不解，不过她还是回瑞金去了。这要走四十英里的路，她花了两天的时间。可是，与她不久即将开始的长途跋涉相比，这只是一次短距离的散步而已。^④

在江西省会南昌一座临湖的宏伟大厦里，一位剃着光头、身材矮小、风度翩翩的人坐在一张精致的柚木书桌前。当他拿起当地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时，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翘，嘴角泛起一撇满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关于签订一座铁路桥梁建造合同的头条新闻，掠过那一堆宣传强肾壮阳补药、妇女病特效药和珠宝首饰的五花八门的广告，最后停在主要社论上。那天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纪念日，那篇社论是谈当前问题的。它提醒人们莫忘有自然灾害，莫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共匪利用中国的困境而猖獗一时。人们应当从善，戒酒戒舞，为中华祖国的生存而奋斗。所幸江西的局势正在迅速改善。共匪将在年内被歼灭。他们已被团团包围；他们为了不让士兵逃跑，不得不把士兵用绳子绑在一起。他们崩溃之日已经不远了。

这位读者一面看着报纸，一面轻轻地咂着嘴巴。这些话都是他赞成的，事实上正是在他自己提议下写上去的。他的姓名叫蒋介石，这年四十八岁，这次来南昌是为了指挥国民党军队扫荡“赤匪”。事情进展顺利。几天以后，他下令把专机调来，准备起飞去陕西、宁夏、四川作一番短促的视察。^⑤

共产党的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区。三军团侦察参谋是一位身体墩实、谈吐泼辣的小伙子，姓孔，是年二十三岁，后来他一辈子都是一位直言不讳的革命军人。三军团那时正在休息。它是在经过一场激烈而不太成功的战斗以后，在两个星期以前从前线调下来的。此刻正准备让它去参加新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是非常保密的。孔的同志们只知道他们很快又将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做法受到了很多批评，认为它起到了事与愿违的反作用。）孔知道的比他的同志们多得多，因为他是侦察员；但是他不讲。他象他的许多同志一样，出身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家里共有兄弟五人，姐妹七人。他家里反对他参加红军，因为他的父母信守中国传统的格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是，孔无论如何还是参加了红军。他想得到土地，而红军答应他会分到土地的。

在孔所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且俘获了该师的将领

——一个万人痛恨的、名叫张辉瓒的、红脸膛、大个子湖南人。五十年以后，孔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在山坡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城里任何一个广场都不够大），张辉瓒被拉到参加大会的农民、城镇贫民、手持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经过战斗后疲惫不堪的满腔怒火的红军战士们面前。他站在台上，头戴高帽子，双臂被反绑在背后，群众高呼要砍他的头。不一会儿，他的头就被砍了下来，并且被放在一只木筏上顺着赣江往下漂，作为对其他国民党将领的一种警告。孔一回忆起这件事情就十分激动，以致他讲着讲着竟吟唱起当时人们所唱过的一首歌谣来了：“龙冈打一仗，活捉敌人张辉瓒，我们真快乐。”⑥

这一年的十月份，中央苏区根据地及其首府瑞金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活动，焦急不安的情绪不断加重。对于当时红军里发生的事情，这位身材高大、说话细声细气、而且相当有风度的姓伍的年轻人几乎是无所不知的。这块根据地是五年以前由毛泽东和他的伙伴朱德所领导的共产党部队建立起来的。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农民们都把这支部队称作“朱毛”军，而且许多人都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种叫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朱德这位举止稳重、作风朴实的大个子共产党将军有一次曾经解释说，朱和毛是分不开的。这是中文里一句相当精彩的双关语，因为“朱”意味着“猪”（汉字写法与“朱”不同），而“毛”的意思是“毛发”。⑦

伍修权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都了解，或者说几乎全都了解，因为他替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指挥中国红军到那时已经有一年多了，但始终搞得不成功，确实令人沮丧。

伍修权那时二十八岁。他在十九岁曾同另外一百名中国青年人一道去苏联，在那里呆了五、六年时间，既学习俄语，又学习革命经验，学习军事。他回中国已经有三年了，自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苏区以来，一直担任李德的翻译。

当时伍修权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不过这是一个烹调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

李德来到苏区以后，中国人不辞辛劳地想方设法让他过得舒适。他住在一幢专门为他盖的三间新屋里，房子座落在一片稻田中间，离红军总部约有一英里，距离党的总部也不太远。这幢房子相当孤零零，它的环境中有些特点促使伍修权等人把它称作“独立房子”。不久，“独立房子”成了人们私下叫李德的绰号。

伍修权面临的问题间接地来自那些稻田。他和李德的参谋人员在满处都是青蛙的稻田里养了十几只鸭子。这些鸭子已经长得很肥。他可不想把它们留下。于是，那几天每天晚饭都吃鸭子。伍终生难忘，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吃掉了最后一只鸭子——那是一盘油光泛亮的香酥鸭块。他总是把这一天同红军出发长征的时间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一般都认为长征正式开始的日子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⑧

日月流逝，秋日渐暮，党的干部中间的议论也渐趋公开。对于那些懂得如何弄清字里行间的含意的人来说，甚至还有书面的暗示透露今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曾为党报《红色中华》撰写过一篇社论，说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

生力量……成为必要的任务。”

上层领导中谁都知道正在着手进行的转移，但他们不知道将向何处转移。有人猜测将去湖南，有人猜测要去江西的另一个地区，有人认为将去贵州，有的人则猜测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一级的人员以外，谁都不知道将要去何处。当干部们在瑞金以北云石山的防空洞里相遇的时候（总部已迁往该处，以躲避蒋介石的战斗轰炸机，当时蒋有二百架战斗轰炸机），他们会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快到了。”有时他们会问：“你走吗？”回答则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说：“当然要走。”另一些人则会说：“我不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我不知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走。实际上，正如蔡孝乾所追忆的，这一消息如巨石落水，打破了平静的局面。许多人都心神不宁。上面开始拟订种种名单。有些亲属带着衣笼皮箱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向人们解释说：“他要走了”（但不说到哪里去）。有些伤员从医院疏散回自己原来的单位。关于谁走谁留的传闻纷起，其说不一。起先传说，曾经在长沙师范学校当过毛泽东的老师的徐老（即徐特立）将留下来，因为他年岁太大，经不住途中的艰辛。后来又传说他也要走，他已被分到干部休养连，而且已经给他找到一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⑨这些传说所没有提及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已经看到一张内定要留下来的人员的名单，上面有许多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如他的弟弟毛泽覃和泽覃的妻子贺怡（她既是毛泽东的弟媳，又是他的小姨子，因为她是贺子珍的妹妹，当时毛泽东已同贺子珍结婚），毛泽东的朋友、湖南同乡、同为共产党创始人的何叔衡，共产党早期的总书记、现已解职的瞿秋白（据说他的肺结核病太严重，不能带着他走），司令员陈毅，共产党早期党员、毛泽东的支持者贺昌，毛泽东的另一位拥护者、宁都起义领导人刘伯坚，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似乎毛泽东的建议一项也没有被接受，甚至连他恳求把瞿秋白带走的意见也没有被接受。只要同毛泽东有关系，就等于是领到了一张留在苏区的票。照那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当时留在苏区得以幸存的机会大约只有十分之一。⑩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秋天已满四十岁。他脸庞瘦削，两颊深陷，又直又硬的黑发长几及肩，瘦长的身材，高高的颧骨，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身透出一种痛苦的气色。他已经病了几个月，疟疾反复发作。尽管教会培养出来的医生傅连璋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仍然没有完全康复，身体孱弱，心境不好。他知道红军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在这一决定作出以后，周恩来已经告诉他了。周当时实际上起着参谋长的作用，他是参加讨论的，但是发号施令的是李德，而党的书记博古必定总是支持李德。即使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总是两票对一票，他是少数。然后，他的任务就是象一位好的军官那样忠实执行最高指挥部的决定。

此事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时在居于支配地位的“俄”派内部有一股强有力的势力要把毛泽东开除出党。⑪毛已在两年前被调离军事政治决策岗位，只留下一个徒有虚名、毫无实权的中央苏区主席的职衔。他主持一些地方上的会议，而且在于都进行所谓地方情况调查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此时居住在这座河边商业城市里一座舒适的带庭院的青砖瓦房里，这座房子座落在差不多紧挨着于都县北门城根的一条狭窄小巷里。他同妻子贺子珍一起住在那里。贺子珍那年二十四岁，已经怀上第四个孩子，预产期为次年二月。⑫

当时有一种传闻，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有人重复这一说法，那就是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是政治局成员，但他没有自由到瑞金同政治局商谈；他同军事政治领导机构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现在看来，他当时并未受到软禁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作者与之晤谈过的参加过长征的主要幸存者全都肯定这一点，当代中国党史学者和档案工作者也肯定这一点。然而，恰恰在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就要作出和执行的那几个星期里，为什么会想到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当时很难说有任何迫切的需要，非得让毛去于都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不可。照当年给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的看法（他的工作使他能够了解实情），那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他说：“毛是被故意排除在外的。这只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⑬

一九三四年春天曾经想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一点没有谈到这件事。但莫斯科拒绝了这一建议。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问题，但当时仍然需要利用他的威望和名声。而且，用伍修权的话来说，毛泽东已经宣布过：“我决不去。我决不开中国。”^⑭

双方情绪都很激烈。有一个第三手材料讲到，毛泽东有一次在保安街上同埃德加·斯诺一道从博古身边经过时曾经对斯诺说：“你知道吗，那个人过去曾经想杀掉我。”^⑮如果说在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曾经想除掉毛泽东，那几乎是毫不意外的。但是，还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证实当时确曾策划要强迫他留下来。

他一去于都，就不可能随意去找政府机关、党的机关和政治工作机关了，因为这些机关都离得有一两天的路程。但是，他的随身警卫员并没有撤掉，他在于都及其周围地区仍可自由活动。

住在于都与他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住在云石山是大为不同的。在云石山，他的住所座落在一道石坡上，是一个有两段石阶高的石台上的一座漂亮的小寺院，离红军总部不超过一英里。毛在政治局里的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住在一间侧厅里。他们常有机会促膝交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交谈是非常重要的。毛要去红军总部十分容易，不过他很少去，因为他的意见当时不受重视。他们常常不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但是，他常去中央苏区政府的办公室，他是苏区政府主席。这些办公室离他的住所不远，位于一个叫做沙洲坝的地方，是一九二二年修建的一座相当气派的杨家祠堂。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左右。杨家祠堂里有一间雅致的上下两层的会议厅，那是一些很好的深色板壁房间，铺着石板地。这也是朱德和他的妻子康克清、陈毅以及周恩来的住处。但朱德夫妇通常都在前线，陈毅在受伤之前和周恩来也是如此。^⑯

蓄意不让毛泽东参加决策过程尚不是问题的全部。^⑰这个时期就象在其他一些艰难时期那样，毛泽东生病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那年十月，他不是因为得了疟疾卧床不起，就是尚未真正康复。他的精神很差，而且可能心境一直很低沉。

这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主要由他缔造的革命运动，他和朱德创建的军事力量，他在五六年前开辟的共产党地区，在他主持下建立起来的整套机构，全已落入莫斯科共产国际所派来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阿谀逢迎的博古手中。毛泽东已被剥夺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工具。政治局一致反对他。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各种军事机构也把他冷落在外。他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但内心却象开了锅一样。他并不是不了解力量对比状

况，他知道有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暗流。当两位重要指挥员——他亲自培养的林彪和长期忠实地拥护他的聂荣臻——悄悄走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在凳子上坐下来，表示他们是来听取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是懂得这意味着什么的。当他们小心翼翼地问他“我们去哪儿”的时候，他是明白他们的意思的。他知道该如何用含义同样隐晦的言语来回答他们。他说：“命令要你们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知道命令要他们去哪儿，他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他不愿违背保密规定。此刻还不是说话的时候。那样的时候是会来到的，而且他确信这个时刻不用很久就将来到。

将近五十年以后，聂荣臻回忆了他和林彪那次如何急切地希望打听新行动的消息，特别是打听他们将转移到何处去，而毛泽东又如何坚决不跟他们谈的情形。毛泽东不希望引起他在同原来在自己手下的将军策划阴谋的猜测。他不再往下谈，而是提议一同去看看一个新办的图书馆。⑩

十月十日午后不久，一群人开始聚集在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梅坑附近一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和煦惬意的秋日。聚集在路口的那些人看上去不象军人。他们总共有男的一百多人，女的二十人或二十五人，都是编入干部休养连的老弱病伤和妇女。每个人都带着一条毯子，一袋食品，希望能吃十天的十斤大米，还有一个背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梳子、毛笔、笔记本、可能还有手电筒——这些东西都是最难搞到的、几节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以及其他必需品。每个人都在皮带上拴一个大搪瓷杯，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一队人当中最老的一位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谢觉哉。他那时已过六十岁，因此为他准备了一匹马。同毛泽东一样，董必武也是共产党创始党员，他当时四十八岁。在他的同志们看来，要是当初把他留下来，他是决不可能活下来的。毛泽东从前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师徐特立，当时已有五十七岁，他身躯精瘦，皮肤干皱如革，谈吐风趣幽默，蓄着一小络稀疏的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一位无畏的女同志——也有一匹马，毛泽东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也有一匹。

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很快就组成了排和班，不分男女每个人都领到一枝带喜庆的红色缨穗的梭标。那是为了在队伍遭到袭击时供自卫用的。太阳即将落山时，邓发来了。他是党的安全保卫工作首脑、秘密警察负责人、整个政府系统非战斗人员纵队司令员，曾经当过水手。他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我们这里有音乐家、剧作家和作家。要是想举办一场演出，不论需要什么人材，我们这里都有。”这下气氛变得稍微轻松一些。这支队伍在薄暮时分出发，朝着于都方面前进。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一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贴上一颗红星，使他们不致于迷路。⑪

毛泽东比他们出发得晚。首先，他有任务要完成。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十月十五日要在于都向党的干部讲话，这些干部都是要留下来的人。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走；他还必须使他们在思想上对主力撤离后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及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多少有所准备。这时，于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不相信正在发生某种不寻常的事情了。成千上万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于都，又开出于都渡河而去，或者朝安远方向南进。

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年轻战士肯定没有得知真情。他们相信他们是要去打一场大仗。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冲出包围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感到

诧异)，而且上面要求所有的人的米袋里都要带够十天的口粮，但又特别留意不泄露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

毛泽东那时仍在接受傅连暲博士的治疗。他面色苍白，带病在党的干部集会上以尽可能信心十足的口吻讲话。他的具体谈话没有保存下来，但他毫无疑问是传达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军队是要去突破包围圈，建立新的根据地，挫败蒋介石发动第六次围剿的计划。干部们应该照常坚持工作。各军团将分散活动。红军将留下相当多的部队保护苏区。他们不会一去不复返的，他们是会回来的。他确信革命最终必将胜利。

这次会议名为高中低三级干部会。就在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各军团首长和整个党的最高机关都已经在转移了。中央机关已经在十月十二日抵达于都，此刻正在夜幕的掩护下穿过于都。一共雇了几千名挑夫（一天一块银元）^{②①}，担着苏维埃的财产——印刷机、印钞票的雕版、造子弹的机器、给废子弹重新装药和安引信的工具、X光机、一箱箱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官方文书和文件、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无线电和电话设备、大卷大卷的电话线。毛泽东后来说，“那真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举国大迁移”。这种说法有些过分夸张。还是毛泽东的比喻中肯恰当。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人员，包括警卫员、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县北门旁那幢房子的有小石墙的院子里集合，然后走出院子，加入到中央纵队其他单位的行列中去。他带着一口袋书籍、一把破雨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大衣、一块油布，但留下了他那个共分九格的挎包。

一次撤离共产党人几年来搞得很红火的舒适根据地的退却，就这样开始了。毛泽东知道这将是一次危险的撤退，甚至很可能是致命的撤退。他们总是偷偷地进行，希望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轰炸机就会发现不了他们，无法向这些从头到尾蜿蜒达六十英里之长的庞大队伍倾泻密如雨注的炸弹。这是一个人们表情严肃、面容冷峻的时刻，一个需要果敢决断的时刻，而不是争辩发问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说这一切可能引向何方。毛泽东不知道，博古不知道，李德不知道，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测不出这些缓缓行进的队伍可能维持多久不被蒋介石察觉。没有一个指挥员能不为那些负担过重的挑夫担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挑着再重不过的担子，很难维持一天走两英里的速度。

一营工兵在于都河上架设了五座浮桥。每到这个季节，河里水位很低，于都地段河宽不超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河面较宽的地方水很浅，人和马匹涉水而过是毫无困难的。那五座浮桥分架在于都县城往东往西各几英里的河面上。

毛泽东一行沿着河岸走了没有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于都河很平静，夜空也很寂静。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渡口，接着就喀嚓喀嚓地大步从浮桥木板上走过去。这河过得很容易，不久这一行人就已经到了对岸，并且接着往西走了。秋夜的宁静，皎洁的月光，河水拍打着浮桥的哗哗声，这一切都使这些男女红军精神振奋；在他们排成单行或双行沿着狭窄的小道向前行进的时候，许多人开始轻声地唱起歌来，唱的是红军的一些老歌子。他们正沿着一条未知的路线，走向一个他们之中谁也猜测不出的目的地。

第二章

“赤匪”的崛起

事情很顺利，非常顺利——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在南昌登上飞机，飞往中国动荡不安的西北亲自进行一次视察的时候，必定是这样想的。跟往常一样，他的妻子美龄——长相漂亮的宋查理最小的女儿同他一起前往。自从他们结婚以来，美龄极少远离蒋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婚礼，应邀出席的宾客达一千五百人，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卫理公会牧师宣布他们结为夫妇，一支俄国乐队奏起《新娘来了》这支曲子，而一位美国男高音歌手唱了《哦，答应我》。蒋介石此次西北之行的第一站是陕西省省会西安。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和目前的第五次“围剿”的四年期间里，蒋介石很多时间是在南昌度过的。他相信由于他的德国军事顾问们提出的新战术，共产党人现在终于陷入了绝境。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翻脸攻击他的共产党盟友以后，俄国人撤走了，他就请来了德国人。蒋手下的刽子手们砍下了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头，以致他们的胳膊累得连大刀都举不起来了。

俄国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缔造者孙逸仙博士在世时到中国来的，而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把孙逸仙的外衣披在自己窄窄的肩膀上。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在蒋介石当校长的时候，加伦将军等人曾赢得过他的尊敬。^①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如果他能够抓住他们的话，他本来是会把他们以及斯大林派驻中国特别代表鲍罗廷全部杀掉的。蒋在攫取权力的斗争中，是不惜屠杀在中国的一切共产党人的。

不过，那是题外话了。从军人的角度来说，蒋对在江西与他交战的那些共军司令员是多少怀有几分同行间的敬意的。从他们一起在孙博士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起，他就认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赤匪”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蒋的副手。其他许多人都在这个军校呆过，但毛泽东没有。蒋从未同毛见过面，但蒋了解他的许多事情。当然，他还认识“赤色分子”的另一位领导人——性格倔强、是年四十八岁的老朱德。朱德在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以前曾是军阀手下的将军。

不管蒋怎样轻蔑地称他们为“赤匪”，他没有理由低估这些人。尽管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依然继续生存了七年之久了。可是，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大功快要告成了。正是希特勒派了他的一名最优秀的将军塞克特到中国来，而正是塞克特制订了即将把共产党人扼死的碉堡战术。

塞克特指挥国民党军队非常缓慢、非常小心地向前推进，而且一面推进，一面修筑地堡和碉堡（过去一年共修了三千个）来控制每一条大道小径。这些碉堡渐渐形成牢牢地箍在共产党人身上的锁链。塞克特把这条锁链越拉越紧。他卡住了他们的贸易，使得他们无法把稻谷和玉米卖出去，谁都不能进出他们控制的地区。农民们一连几个月没有盐吃，没有煤油，也买不到棉布。

别的方面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以前，共产党军队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们诱使国民党军队深入他们控制的地区，然后用致敌死命的伏击打得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共军缴获了大量枪炮弹药，而且用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兵来补充他们的部队遭受的损失。

现在他们不再这样做了。共军同蒋展开损失巨大的正面战斗，拼死保卫他们的地盘，仿佛每一寸土地都是宝贵的。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广昌战役中，他们坚守阵地，同国民党军队打成胶着状态。这次战役中他们的伤亡至少八千人，也许还要多些。蒋的损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但是蒋能够通过多抓壮丁来弥补他的损失，而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人打胜了这种战役，他们遭受的损失也是承受不起的。②

当蒋乘坐他那架铝翼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新飞机向北飞行的时候，他是可以怀着某种满意的心情展望未来的。共产党人的存在一直妨碍着他巩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那些永远阴谋反对他的地方军阀。在共产党人这个障碍排除以后，他甚至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从而增强他同已经占领满洲并且威胁着中国本土的日本人讨价还价的地位。希特勒现在正在帮助他打共产党，在同日本人讨价还价时，也许他会暗中相助的。俄国人也可能悄悄帮忙。在蒋介石还在打共产党人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出力帮助的。然而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后的中国，在对付日本的威胁方面对斯大林来说应当是有很价值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去，高高地飞过长江上空，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丘陵地带。在他身后，在江西南部地势险要的一角，共产党人仍然呆在那里，他们被圈在一个越来越紧的铁箍里。让他们挣扎吧。这一次他们逃不掉了。正如《民国日报》所说的：“他们今年必定完蛋。他们已被团团包围。他们崩溃之日已经不远了。”在蒋从西北回来以后，他就要下达最后攻击令。

蒋介石确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在南昌没有多少人会对他的这种看法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其他地区，共产党的形象也许是模糊不清的，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南昌对它了解得比较清楚。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南昌就认识共产党了。当时他们夺取了这座城市，然后向南进军，希望把被蒋介石淹没在上海的血泊中的那场革命重新恢复起来。

南昌起义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青人，他相貌堂堂，才华出众，具有非凡的说服别人的本领，后来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有一次，他说起自己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清朝官吏家庭”，象许多同代中国青年一样，他一有机会就投身于激进的学生运动。他曾远涉重洋到欧洲，在法国雷诺工厂做工，在巴黎和柏林学习，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开始的伟大的北伐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在这场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中，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前进。目标是上海，然后，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北京。周恩来赶在前边，帮助上海工人举行起义。事实证明，头两次起义时机不成熟，因此被镇压下去了。第三次起义成功了。几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夺取政权，并且准备欢迎蒋和国民党军队。

可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早晨，上海响起的孤零零的军号声，宣告的并不是周